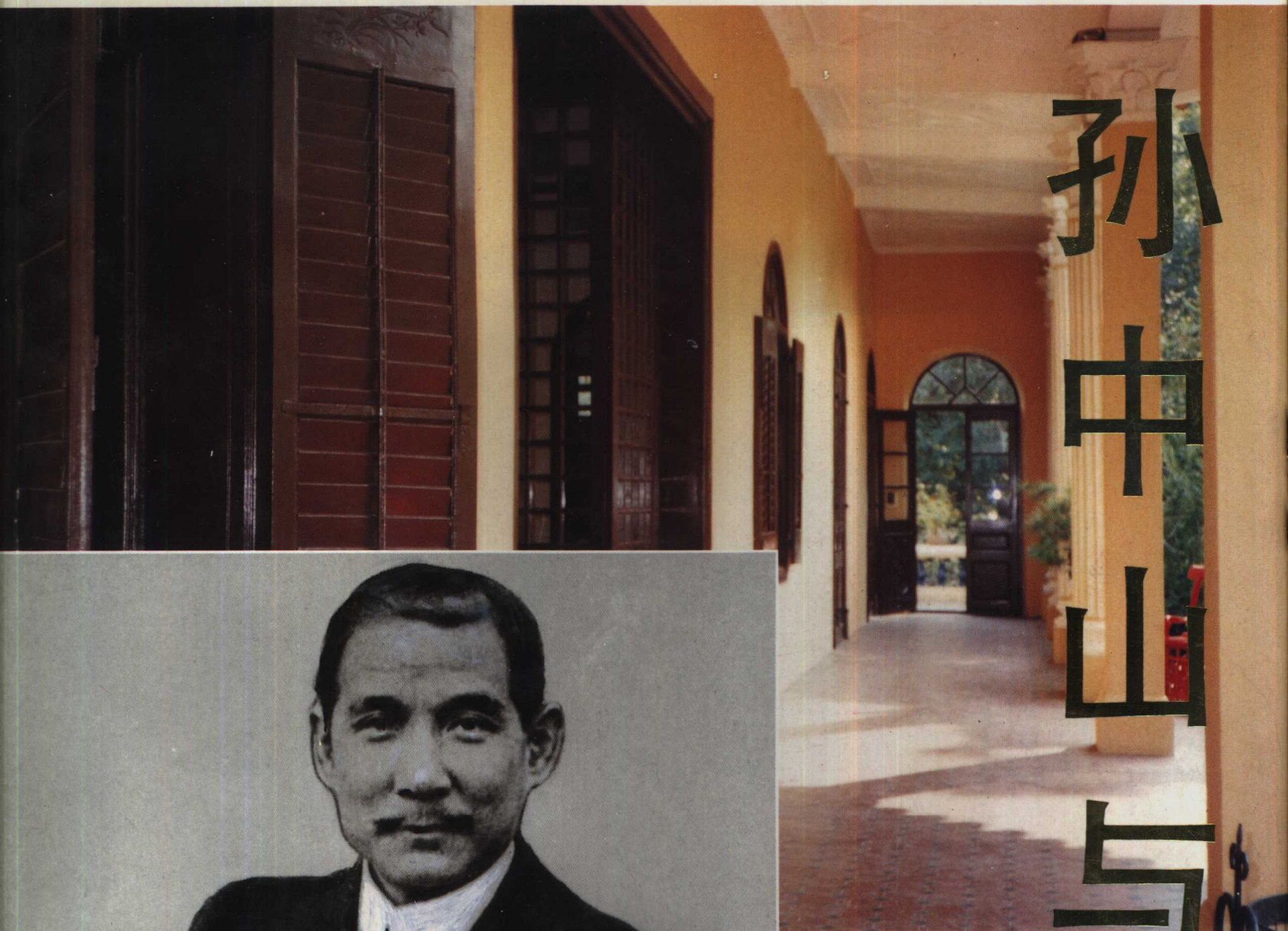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与澳门

文物出版社



孙中山与澳门

盛永华 赵文房 张 磊

文物出版社

K827.6
S986.2

(京)新登字 056 号

孙中山与澳门

*

盛永华 赵文房 张 磊 编

文 物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中华商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1/16 开 印张 10

ISBN7 — 5010 — 0538 — 9K.214 定价: 50 元

130000

谨以此书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
暨孙中山先生诞辰 125 周年



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出版赞助者的话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的一位伟大革命家。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光辉业绩，永远令人景仰。今年是辛亥革命 80 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 125 周年，国家文物出版社为此编印《孙中山与澳门》图册，向海内外人士提供有关其人其事的珍贵史料，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澳门蔡氏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11月，宗旨为推动澳门教育文化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起人兼董事长蔡继有先生是广东中山人氏，孙中山先生的同乡，热心公益，而对兴学育才，更具热忱，先后获授沈阳、中山两市荣誉市民光荣称号。孙中山先生与澳门，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各地中山市乡里人士，对孙中山先生景仰之心尤为浓烈，现在由蔡继有先生主持的澳门蔡氏教育文化基金会，赞助《孙中山与澳门》图册的出版，不是饶有意思的事吗？

澳门蔡氏教育文化基金会

1991年10月

一个巨人与他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

(代前言)

孙中山——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

澳门——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最早的门户之一。

杰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无疑是哲人们长久思索的重大课题。深入地对之进行探究，显然是意味深长的。“人杰地灵”，这句古老的谚语一般地触及了二者间的关系。更为科学的论断则是：杰出人物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烙上了杰出人物的印记；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是双向的。

在中国近代史的领域中，上述命题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试看向西方学习和从事社会变革的一些主要先进人物，大多为广东籍，至于他们的故里，则全然处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半径约为百余公里的地区。这当然决非偶合，孕育了许多精英人物的、基本上属于珠江三角洲范围的这个区域的特色恰恰在于：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蘖较早，毗邻澳门和香港。而这些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又给予当地和全国以积极影响。很难设想，孙中山——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故乡会是当时尚很闭塞的内地山区。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澳门成为孙中山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而他的活动，又为澳门书写了光辉的史篇。

(一)

任何杰出人物的作为并非随心所欲，他的眼界、观念

和构想为时代所制约，而其活动只能凭借于现实生活的舞台。但是，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出类拔萃者则常是某种社会思潮或运动的先导，他们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孙中山以近 40 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领域中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不平凡的政治生涯延伸过两个世纪，并贯串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前后阶段。在中国社会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沉沦过程中，他的业绩成为引导中国社会上升的第一个主要阶梯。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他都堪称为巨人。他曾多次环行世界，能操几种语言；他求索于人类的思想宝藏以锻造救国拯民的真理，并在斗争中思考抽象的哲理；他几乎毕生从事“涤荡旧污”的“战争事业”，时而身兼统帅与排长；他能与时俱进，决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前固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睹共和制诞生于封建帝制的废墟；他遭受到纷至沓来的挫折与失败，迭被通缉和绑架；他总是毅然前行，永不为“槁木死灰”的心境压倒。当然，他的思想、实践乃至性格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头颅的神祇，而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巨人！

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扮演了民族英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角色。他必得担负起开拓的重任，因为现实是极其严峻的：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呼唤变革的维新运动，都未曾使中国臻于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只能以悲剧告终。为了真正打破旧秩序，必需进行新的斗争：制订包括共和制的民主主义政纲，组织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持续的反清武装斗争。他继承了前辈的未竟大业，又跨越了他们的足迹。他的活

动虽也不能避免令人痛苦的结局，但却标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正规阶段。而在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到来后，他积极迎接了时代的大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经由反思和扬弃，他使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盛名、威望和高龄没有导致思想的僵化和盲目性。

他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他的奋进的一生大致可以形象地表述为一个再加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的前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而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后期的活动，其峰巅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弭平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的逝世，中绝了弧线的高扬。

为了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在“悲剧的高度”，因为他乐于献身的理想宏大而崇高。对于人类的进步事业而言，他的活动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他的事业虽未及身而成，却完全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他的英名永垂青史，并为人们世代传诵。

(二)

与这位巨人关系密切的澳门，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曾以它独特的地位而起作用。

这个不大的海港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属辖于广东省的香山县，距孙中山的故乡——翠亨仅 30 余公里。澳的涵义为船舶停泊的港湾，因之它又名香山澳。另一个较后获得的名称马交，则是葡萄牙文 Macau 的音译。最初踏上这片土地的葡人首先看到的是建立在海边的海神天后庙妈祖阁，遂以葡文译音 Macau 称之。以讹传讹，相沿至今。这个并不确切的舶来称呼，隐示了它后来四五个世纪的奇异的命运。

南宋以前，澳门人口稀少。明中叶时成为沿海渔民停泊场所，间有香山居民前往采石。1529 年，广东巡抚请开海禁后，澳门渐成中外贸易的互市地点。16 世纪中叶，葡人借口航船在附近海域触礁，需要借地晾晒受浸货物，贿赂当地官员而得登陆澳门。他们后来定居南湾一带，并擅自筑造墙垣和设置防哨，不久又以澳门为租地，年租为 500 两银。中国政府曾经采取过一些抵制措施，但未奏效。清初，香山县丞移驻前山寨分管澳门的“民夷”事务。鸦片战争后，澳门进一步沦入外来者手中。1887 年，葡萄牙政府通过不平等的《会议草约》和《友好通商条约》，最终据有了澳门。

澳门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港口和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士——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发生过密切关系，为救亡和变革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具有特殊条件的门户和舞台。而它在孙中山的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超过了许多同代人士：少年时代，他多次往来于故乡与澳门之间，外出学习，放眼世界；青年时期，他在澳门行医，踏入社会，志在改造国家；辛亥革命前后，他和

他的战友们在澳门更曾有过重要活动。今天，沿着他留下的足迹追寻：在“杨四寇堂”内，人们似乎听见英气勃勃的“四大寇”在那里慷慨陈词，鼓吹“勿敬朝廷”；在镜湖医院，人们仿佛看到一位青年医生，在向病人赠医赠药的时候，苦苦思索着“怎样造反”；在白鸽巢由义巷的一所破旧的民居，反对清廷的武装起义在密锣紧鼓地准备；在秀美如画的卢园，在风光漪丽的南湾外的海面，酝酿着复辟帝制与捍卫共和的斗争……历史的陈迹，记录了已逝的风云变幻的岁月。

(三)

孙中山的故乡在广东南部的香山县。岭南从唐宋以降开始因“富而通”著称，但他诞生的翠亨村却不富饶：“负山濒海，地多砂磧，土质硗劣，不宜于耕。”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农民，生计艰难。他出世时的家境十分贫困，父亲孙达成曾在澳门充当鞋匠，后返乡租田耕作，并兼更夫。他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家居住在村边的一间平房。从六岁起，他就参加辅助性的农家劳动。偶尔，还同外祖父划艇出海取蚝。年龄稍长，便协助父亲下田操作。他很少穿鞋子。番薯成为经常的主食。生活的艰辛在童稚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后来不止一次地自称：“我是苦力，同时也是一个苦力的儿子。”他还在幼年时就觉得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他后来倡导民生主义，也与“受幼时境遇之刺激”有关。

在香山的民众中，蕴涵着可歌可泣的革命传统。有清一代，农民和水上居民的抗争此伏彼起。鸦片战争时期，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则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群众的保家卫国事迹更是广泛流传。当然，给他以深刻影响的莫过于刚刚覆灭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军战士冯观爽的忆述使他无限仰慕天国的英烈，并为悲剧的结局深切惋叹。后来，他曾多次称赞故乡“人民进取性之坚强”和“爱国心之勇猛”。

沉重的生活并未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他陶醉在自己的意趣中：游泳、捉鱼、放风筝、踢毽子样样喜爱，间或同小伙伴们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同清军作战。直到10岁，他才正式入塾读书，十分热衷于学习，为了节省灯油而在月光下阅读，但对一味背诵儒家典籍颇为不满，曾要求塾师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涵义。周遭的封建陋习越来越引起这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孩子的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姐姐的缠足，更使他异常愤怒。他曾因劝阻赌博遭到殴打，又为诘责专横的胥吏险被刺伤。他还提出和思考关于天地生死的问题，但却无从索解。社会生活的愚昧、窒闷和苦难，令他困惑和痛苦。他终究是个孩子，久久渴望获取一只美丽善鸣的雀鸟，似乎小小的鸣禽的啁啾，能给他的童年带来一抹亮色。

他开始憧憬、企慕着外部的世界，甚至离乡背井——虽然水碧沙明的兰溪和草木苍翠的金槟榔山永系心头，并在后来长期漂泊异域时化为浓郁的乡愁。他终未能实现那个强烈的心愿：一睹镇上牧师所持有的世界地图。但外部的讯息不断传来，因为香山是侨乡，为生计所迫的居民前往澳门、香港和国外者甚众。他的两位叔父客死异域，长兄孙眉于70年代初也随同母舅前往檀香山（夏威夷）做

工。孙眉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业，上升为拥有牧场和商店的华侨资本家。孙中山从返乡完婚和招募移民的哥哥口中得悉了不少檀香山的风土人情，对地处太平洋中的“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的群岛心向往之，经过几番要求后，他在12岁时终于随母亲踏上泊在澳门码头的英轮，从这个外向的门户，迈向广阔多彩的世界。经历了近一个月的航行，他们抵达了万顷碧波环抱的美丽的岛屿。初次远行大大开阔了少年孙中山的眼界，正如他后来所忆述的：“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他在檀岛生活了五年，从当地的英、美教会所办的学校中接受“欧洲式的教育”。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开展，给他以很大的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1883年夏，孙中山辍学回国。

他进入了青年时期。广阔的视野，新的知识和观念，变革社会的热忱，“神圣的权力不是永恒的”见解，使他对睽别数载的故土感到陌生。胥吏的敲榨勒索，更激起他的愤怒。他在初入国门的船上便不禁向旅客们大声疾呼：“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能坐视不救吗？”回到故乡后，他一度参加耕作和继续自修。但是，黑暗腐朽的社会令他窒息。他指责官府的弊端，并提出一些改良乡政的措施。同村的青年陆皓东、杨鹤龄等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读书和议论时政。不久，他们的反封建迷信行动酿成了轩然大波。翠亨乡民膜拜北帝庙中的神像使他厌憎，“劝勿妄信”没有效果，他与陆皓东进入庙

堂损毁了土偶。他们被迷信的乡民视为“疯孩子”，他更被迫离乡前往香港求学。

他先后在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读书，课外努力补习国学。在这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这是继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又一次对中国施行暴力，加深了民族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发展。民族意识的昂扬给他以“希望和勇气”，他认为香港工人拒修法舰和停止装卸法货的正义行动“证明中国人已有相当觉悟”，如能依靠“民众力量”和制造“钢铁的船”，中国“战胜法国并非难事”。他从此更为关注清政府的军事体制和力量，否定现存政权的观念潜滋暗长，曾不止一次地向挚友们表示，学有所成后“就要准备推翻满清”。“余自己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他后来的忆述，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

1885年夏，他返回乡里与同邑外坐村人卢慕贞结缡。

他于翌年修毕中学课程，面临着专业和生活的抉择。捐官、投考神学院的建议被否定了，学习军事和法律则是他的志向。然而，祖国的落后的医药卫生状况，特别是中法战争中救护工作的严重缺陷，引起了 he 深切的思虑。他终于选择了医学，“以医亦救人之术也”。他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校，留给人们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教学中“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主张——要求男生参加产科实习，并使校方采纳了这个破除封建陋习的建议。他与同学郑士良和广州算学馆的学生尤列过从甚密，经常议论“维新兴国”的有关问题。郑士良与会党关系密切，孙中山通过这位同窗的中介开始接触中国的秘密会社。

1887 年秋，他转入香港伦敦布道会和香港议政局议员、著名维新人士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因为该校“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他在这所采用英国医科大学学制的书院中学习了五年，研读了物理学、植物学、解剖学和药理学等学科，取得优异成绩。12 门课中有 10 门被评为“H”——80 分以上的荣誉成绩，从第二学年起始终名列第一。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专业知识，刚刚逝世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令他心折。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使他兴奋。他还“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并通过阅读国学典籍探究中国“历朝制度之沿革”和“古今治乱之道”。他把“通晓舆图”作为“实学要旨”，经常审视壁上的中国地图，慨叹“如此江山，付之非人”。他在西医书院大体完成了“欧洲式的教育”，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他更为热心地关注国事，经心政治问题。香港和澳门的杨鹤龄家的店铺和居处成为他与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的聚会点，西医书院附近的杨耀记则是主要的议论场所。满怀爱国和变革热忱的年青人经常踏着陡峭的石阶，走过狭窄的街道，“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无所忌憚”的言论颇为惊世骇俗，致使他与尤列、杨鹤龄和新结识的同学陈少白被称为“四大寇”。这是他自称的“革命言论之时代”，因为他们已经形成“勿敬朝廷”的观念。而与激进的主张并存的还有温和的维新思想。他在 1890 年前后致函给香山籍的退职官吏郑藻如，提出兴办农会以

倡导农桑，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创置学会、学校以普及教育，并建议在香山实行后推及各地。稍后，这封信以《致郑藻如书》为题发表在澳门的报刊上。他又与不少维新人士交往，同当时寓居澳门南湾的、以《盛世危言》一书闻名当世的郑观应商讨“改革时政”。他的老师何启给予他以较大影响，这位留英学习医学和法律的维新人士的代表作即是流传广泛的《新政真诠》。激进的、温和的变革观念同时蕴涵于他的思想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二者在当时的条件下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封建专制主义起着冲击作用，况且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尚未形成。

1892年秋，他毕业于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给他颁发的医学士证书执照内称：“……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然而，合格的年青医生却已不再满足于个人的职业，他的胸臆中充溢着“医国”的崇高信念，因为“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它慈善事业亦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除去恶劣政府不可”。这种真知灼见表明他已把握了社会改造的关键，决意投身政治活动。在离港赴澳开业时，他在船上对陈少白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准备怎样造反”。

他于1892年秋在澳门行医，在著名的镜湖医院悬壶，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开诊是义务的，院方则贷款给他开设中西药局，许多药品也是赠送。1893年在澳门创刊的《镜海丛报》，详细记述了他当时的业务范围、诊病地点、诊治时间。而对他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更是称颂不已。但是，他并未在澳门久留。那里缺乏政治活动

的良好条件，他深感难以寻求志同道合者，加以受到葡萄牙同行的排斥，致使医业“猝遭顿挫”。因此，他决定到广州去。

他于翌年在省城西关设立东西药局，并在城内双门底圣教书楼开办医务分所，不久，又在香山县城设置药局的支店。一则药局广告勾勒了他的医务的轮廓：“……在药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害，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至，设法施救。”他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赞誉，“病家趋之若鹜”。

他以“医术”为“入世之媒”，越益热衷于政治活动：“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丰盈的收入被大量用为活动经费，药房渐有“不支之势”。他团聚了许多志士，经常在基督教徒左斗山开设的销售译书的书店圣教书楼后面的礼堂和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集会，议论时政，探究途径。他和郑士良等积极“结纳全党，联络防营”，并同水师中的青年军官程璧光、程奎光建立了密切关系。组建团体的课题业已提上日程，他和他的同志们甚至提出兴中会的名称，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只是由于人数过少等原因而未形成“具体的组织”。1894年初，他与陆皓东回到翠亨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又与由港来穗代他主持药局的陈少白反复推敲，决定北上投书。他认为当前的变革途径有二，即是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

《上李鸿章书》如能得到采纳，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与自下而上地开展反清斗争的地方革命相较，易于奏效。这年春天，他与陆皓东携书登程，从此告别了医生的